

# 国家建设与民族生态新理念

纳日碧力戈<sup>①</sup>

**摘要:** 国家建设要处理好“一和多”的难题: 国家一体是中国的发展现状, 民族多元是历史上形成的既定格局, 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民族主义理念, 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处理, 已经发生很大变通。要超越民族主义的本能冲动, 重塑“无知之幕”的原初激情。人类学善于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 推出诸如“颗粒式”的不同分类, 对于我们构建有关国情和民族的新隐喻, 建设光光交彻的文化创新格局, 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中国的国家建设不能走同文同种的同化道路, 不能走一族一国的冲突之路, 只能走多族共生、互守尊严的生态新路。

**关键词:** “一和多”; 原初激情; 颗粒式分类; 互守尊严; 民族生态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 (2017) 04-0010-05

## 民族主义: 简化激情和原初激情

民族主义有多种版本, 可分为东方型和西方型, 也可进一步划分为更多类型。例如“汉字精神”主导下的中国,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民族主义, 都有要求国家匀质化的目标, 或从功利效用出发, 或从感情信仰出发, 都会要求“同文同种”“同文同国”“同语同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民族主义的多种版本特点凸显了地方化的重要性, 也为“本质主义”<sup>①</sup>话语留下足够空间。与此同时,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 一些本质主义比另一些本质主义更具优势, 发出的声音大, 曝光高, 传播远, 信众多。劣势本质主义-民族主义者出于实用目的, 为了达到“同文同种”的目的, 实现“一族一国”的梦想, 就会祭起优势民族主义的大旗, 以驱逐或同化开路, 偶以灭绝为选择, 用激情简化民族主义的多样, 以功利统辖各派利益, 结成统一战线, 型塑共同对外的阵营。如民国初期的“驱逐鞑虏”的口号, 如恢复 18 省的提法, 都是借用外来本质主义,<sup>②</sup> 强化本土民族主义的实例。

激情不仅简化各类群体主义(如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为大民族主义, 也将各类人际关系加以简化。例如, 原本是朋友, 却因民族主义而结仇; 原本是敌人, 却因民族主义而结盟; 原本是亲家, 却因民族主义而反目; 原本是路人, 却因民族主义而亲近。

中国等国属于后发现代政体, 其建国理念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催生, 其现代性本质主义<sup>③</sup>

①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阶段性成果(13AZD057)

作者简介: 贵州人类学民族学高等研究院, 教育部长江学者(贵州 贵阳, 550018); 复旦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教授(上海, 200433)。

①我同意赫茨菲尔德的观点, 本质主义是现实存在, 要承认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不要再把国民国家和本质主义全都看作日常经验中遥不可及的敌人, 而是要看作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方面。(Michael Herzfeld, *Cultural Intimacy: 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2)

②清代西方社会进化论进入中国, “种族”成为分量很重的关键词, 社会精英以“保种”为己任, 不齿与“黑人”同类, 革命党人创造使用或恢复使用许多本质主义的“种族”概念, 对外称“洋鬼子”“鬼奴”“番鬼”“岛夷”“碧眼夷奴”和“红毛番”; 对内称“夷狄”“胡虏”。王夫之以“品类”区分夷夏, 认为“人禽草木”不能“互相淆杂”。冯 客: 《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 杨立华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35页、第26页。

③即为了建立现代性国家而创造或恢复的实用主义或“古为今用”的本质主义。

属于劣势本质主义，因此精英们就需要借用强势本质主义话语，尤其是“种族”“民族”之类的关键词，整合“同文同种”的激情，简化原有的“垂直分类”，即打破原来的家族主义和村寨藩篱，打破原来互不相属的孤立主义，把原有的复杂“小激情”简化为统一“大激情”，化阶层的“垂直排列”为公民的“平面分布”，<sup>①</sup>建立建设同文同种的现代国家。

简化激情有助于本族迅速凝聚，高效建国，动员成本低，响应范围广。民族主义“简化激情”将感情、功利、利益集于一身，以族为界，画地为牢，内聚外斥。但民族主义有盲目性，激情推动，缺乏理性，会有意无意地“伤及无辜”，有时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所以，即便是以民族主义起家的领导人，待大功告成后，也会提倡理性，追求功利，限制民族主义的盲目性。多族一国的历史和现实，迫使民族主义者“痛定思痛”，在跨族协商中寻求利益最大化，让步妥协不可避免，重叠共识有利于共和共生。

要限制后发的民族主义简化激情，除了“依法治国”，制度保障，通识教育，理喻共识以外，还可以追寻原初激情。激情有原初性，如亚里士多德将语言起源归因于“灵魂激情”(affections of soul)<sup>②</sup>《礼记·乐记》称物动人心，心生音乐。如果说民族主义属于“简化激情”，那么，“魂激语生”和“感物生音”就属于“原初激情”。“原初激情”是超越民族主义“简化激情”的共享原点，是重叠共识的首要根基。这近似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sup>③</sup>把所有功利的预期放到一边，在近乎白板的状态下讨论认同，以人类最普遍的直觉作是非判断，超越语言和文化可能带来的偏见，取得共识。中国进入现代，走向未来，需要超越民族主义的简化激情，重塑“无知之幕”的原初激情。

## 中国“民族”的可塑性

前辈学者出于爱国之心争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问题，7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中华民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从外部看，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华民族是一个；从内部看，从语言文化立场出发，中华民族是多个。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单一，作为文化综合体是多元的。即便是在英语中，nation和state也不好区分。The United Nations是“联合国”，当然也可以是“联合族”；The United States可以是“美利坚合众国”，也可以是“联合国”。

研究中国民族离不开中国各民族的历史，离不开大中国型塑的过程，离不开战争与和平的碰撞史和协商史。仅举盛唐衰微的历程，就足以说明多族共建的记忆可以追溯到多么久远：边城范阳作为横跨“华夷”的政治中心，地位一再提高，与大唐国运式微形成对照，这座边城依次成为“契丹-辽帝国的副都南京、女真金帝国的首都中都、蒙古世界帝国的首都大都”；<sup>④</sup>“换句话说，它意味着这不平凡的六百年孕育并实现了‘中华’从‘小中国’——这个‘小中国’在盛

①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 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人类的内心经验相同，表达内心经验的口语和文字不同；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解释篇》第1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③ “无知之幕”就是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约定好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在走出这个幕布后将在社会/组织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大家讨论针对某一个角色大家应该如何对待他，无论是市长还是清洁工。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不会因为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给出不公正的意见，即可以避免“屁股决定脑袋”的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置，因此这一过程下的决策一般能保证将来最弱势的角色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当然，它也不会得到过多的利益，因为在定规则的时候幕布下的人们会认同那是不必要的。http://baike.baidu.com/link?url=kexbCF7g2D-FzKLROFmedq3ifpKP8xd83BKqs4mbNz88WvAevZOOEZ5f8QYBgwnwSDgc5x6uJ\_hDP6gFUGprrW3U\_Ue2vk5dg8nN\_JSe5SIm4cUDJ2r8abxxSuaNj3nx, 2016年12月1日登网。参见 [美]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136页。

④ [日] 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5~36页。

唐时期曾膨胀到它的极限——变型为‘大中国’的‘一次漂亮的转身’”。<sup>①</sup> 纵观大陆中国，古往今来，无论是大民族还是小民族，或是大小民族之间，文化和而不同是主旋律，政治分而合一是大格局。

中国的民族本来就没有按照英美俄的模式来识别、确认和构建，就像汉字文化，特殊性多，差异性大。普遍性固然不可忽视，但特殊性不能被遮蔽。按照斯大林民族模式，中国的汉族只能当“部族”，不能当“民族”；至于那些人口较少民族就只能轮到当“部落”了。不要忘记：中国的“民族”都是“飞跃”成“民族”的，感情和尊严，“自立于民族之林”的需要，让中国各个民族只能当“民族”，不能当“部族”，更不能当“部落”。当然，作为中国政府治理对象的“民族”并非无限可塑：有些新近要求当“民族”的人群，只能当“人”，不能当“民族”，如“摩梭人”“穿青人”“僮人”。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系统，有自己的惯性，当然也反映政治需要和社会时尚。56个族群的说法，难以得到政府的认同，也难以被多数人接受。此外，叫“民族”，还是叫“族群”，并不影响民族格局，也不影响民族认同。相反，名称的改动会和“名正言顺”联系起来，释放错误的政治信号，引起思想混乱。中国“民族”是特产，是外来模式本土化的产物，具有不可化约性和不可替代性。它的可塑性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致中和”、求中庸的秉性，大家都叫“民族”，不叫“部族”或“部落”，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可塑性和包容性。

### 本土观的重要性

民族研究面临话语三重性的挑战，即对外和对内的三重性：对外把大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作为代表，造成均质化感觉；对内承认多元一体的现实，规定各民族语言和文化平等；部分民国速成论者强调民族融合，将我族中心主义与国家主义捆绑起来，试图用公民身份取代民族身份。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样的努力很难实现，成本高，效果差，副作用大，不能得到他族认同，有时还会伤害他族感情。我族中心主义者忽视他族本土观，不善于利用民族志浓描，甚至不屑于了解他族的主体诉求，无视他们的能动性，认为他们只有接受“教化”的份儿，没有主体参与的“素质”。若要真正解决问题，就需要采用“历史三调”<sup>②</sup> 模式，兼顾各方诉求，关照各方利益，推衍综合价值，创造重叠共识。

本土观是人类学民族学者非常重视的研究内容，格尔茨高度重视“深描”，努力呈现“思想民族志”，尤其要“理解他人的理解”，凸显“局内观”，而非“局外观”。格尔茨在《地方知识》<sup>③</sup> 中集中讨论地方社群如何理解社会思想，描述他们如何想象伦理道德，勾勒本土的文化意蕴。对于他来说，选择唯物还是唯心的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本土观描述清楚，予以栩栩如生的再现。林耀华先生“把种子埋进土里，把知识传给后人”，不仅限于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要身体力行，走向田野，从大小凉山到康北藏区，从川康到义序。如庄孔韶教授所言，当代中国人要获得前瞻性“感应”，就要让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交互作用，以形成“主动变迁的动因”。<sup>④</sup> 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神交”，首先需要处理好人文世界内部光光交彻、重叠共识的格局，我族中心主义的人文世界不能处理好族际关系，也处理不好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此外，许多民族志记载的社会并不把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并立，而是把它们合二为一，交融一体。对于他们来说，解决好人文世界内部关系的问题与解决好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问题并不容易区分，二者“互渗”，混言不分。这里涉及分类问题，也涉及背后的世界观。如同古希

①姚大力：《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第v-vi页，参见[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②柯文著《历史三调》（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提出从历史学家、事件亲历者和官方等三个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颇具人类学神韵。

③[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本土知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④王辉《把种子埋进土里，把知识传给后人——林耀华学术座谈会部分发言辑要》，《中国民族报》2015年10月30日。

腊人把万物归于“气”“火”“风”等等质料<sup>①</sup>，有的民族志社会把存在的最小单位划分为“颗粒”或“微粒”，人由关系组成，不是由质料组成，因此一个人的关系可以位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即一个人可以由另一个人“组成”。<sup>②</sup>也许这种本体论与科学无缘，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无非是“神话”，是一种“幻觉”，但是其中的隐喻却十分重要，它对于我们如何观察和处理民族关系，有特殊意义。就像中国人用筷子吃饭，绝不是仅仅出于实用考虑，其中一定还埋伏着“关系转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隐喻。

这些民间分类及其相关的实践模式，反映丰富的草根智慧，对于我们处理好民族关系有启发作用。这种来自民间的分类系统，会给正统分类系统注入新鲜血液，带来新生活力，使我们认识到，各个民族之间，各个民族成员之间，可以互生互构，互为条件，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中心边缘，机缘巧遇，平等交流。

### 建设民族新生态

这里的“生态”指民族之间互为环境、互为条件的环环相扣关系，也是差异共生，呈现韵律的关系。所谓民族新生态，关键在于一个“新”字。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新媒体既方便了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了解，互相包容，互相借用，也促进了民族自觉，文化自觉，认同自觉。因此，网络时代对于民族关系来说是双刃剑，既促进和谐，也增加矛盾，关键在于如何掌握其中的韵律，如何实现和而不同，扩大和谐，变矛盾冲突为互补共生，将巴别塔杂语创新组合成为抑扬顿挫，合辙押韵。

在久远的过去，质料、器用和形制圆融一体，并不明确区分，具有“地天通”的气韵。如弗雷泽《金枝》记载，有不少人群迄今用“相似律”和“接触律”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指导实践。那里的巫师根据相似律，认为借助模仿就可以做想做的事；他根据“接触律”认为自己可以用某物影响某人——只要该物曾被那个人接触过。<sup>③</sup>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礼崩乐坏”达至极限，具象与抽象彻底分离，概念统治实践，文字和印刷自成体系，经济理性“权高位重”，人的本质不再直接呈现，被统一的市场关系遮蔽。物感物觉不与象征思维勾连，地天隔绝。时至今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硬件”和“软件”有了创新结合，可穿戴设备把物感物觉归还给人的主体性，不再无选择地依赖键盘和遥控器，把在场与不在场统一在虚拟现实。所有这些都给民族关系的创新发展带来新环境和新机遇。连接成为人际关系新生态的新机制，也为我们摆脱旧有的“冷战思维”带来希望，既承认民族，也承认其他群体，更尊重个体，网络连接为丰富社会分类创造了条件，不同的个体可以在同一时间选择多种多样的身份认同，加入多种多样的网络群体，转换身份，变通差异，协商共识。互联网时代以现代技术回归到原初的形气神圆融，身体又变得重要起来，心与物的关联不再被有意遮蔽。民族有希望超越概念，超越彼此之间的想象敌对关系，以万物关联来补充和突出民族个性，也赋予民族更多的可塑性，扩大包容互尊的空间，增加积极向上的人间活力。

新生态者，要从个体和群体同时入手，不可只强调个体而忽略群体，亦不可用群体遮蔽个体。个体微缩群体，群体凝聚个体。借助网络化手段，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发展新生态，培养新视野，生成新民族。民族是典型的群体，网络化生存让民族群体更多体现在个体身上，突显个体选择族属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他和她有选择和退出群体的自由，也有转换群体认同的自由。

所谓民族新生态就是民族要素内部和外部的新组合，是现代质料的新组合，是体现在这种新组合之上的新风格。重要的是关注质料组合的风格，而不是具体的质料；重要的是关注社会对于差异的组织模式，而不是差异本身。和而不同就是差异共生，就是把不同的质料搭配成为交响

①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论灵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②Marilyn Strathern, *One Man and Many Men*, in Maurice Godelier and Marilyn Strathern eds., *Big Men & Great Men: Personifications of Power in Melane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97-214.

③[英]弗雷泽《金枝》上下卷，汪培基，徐育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乐、大合唱、协奏曲。民族作为一种质料的组合风格，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民族新生态就是这类不同组合风格之间的新型和睦共生的格局。

## 讨 论

国家建设要处理好“一和多”的难题：国家一体是中国的发展现状，民族多元是历史上形成的既定格局，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西方民族主义理念，在传入中国后经过本土化处理，已经发生很大变通。要超越民族主义的简化激情，重温“无知之幕”的原初激情，就要在我族中心主义推动下的狂热之后，重观中国，回顾历史，反思自我，定位民族。人类学善于从本土人观点看问题，推出诸如“颗粒式”的不同分类，对于我们构建有关国情和民族的新隐喻，建设光光交彻的文化创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中国的国家建设不能走同文同种的同化道路，不能走一族一国的冲突之路，只能走多族共生、互守尊严的生态新路。

至今还有很多人糊涂地主张，讲述历史只需要“还原真实的过去”，所以“实证”方法就意味着必须尽量剔除讲述者自身观念的影响。但是我们真的能够还原“真实的过去”吗？真的存在着一种被所有经历了那个“过去”的人们都一致同意的“真实”吗？看来与其悬得过高、空论还原事实，倒不如尽最大努力地去还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各种切身感知，最大可能地借助于各种细节去还原一幅有关过去的越来越精准、清晰的宏观图景。<sup>①</sup>

亲历者的感知和感受对于建设民族新生态有重要意义，亲历者不分种族民族，都要有自我表达、协商对话的机会，通过表达和对话，通过由此产生的重叠共识，就能发展出相应的有利于“美美与共”的实践模式，顺应新时代、新环境的民族新生态就能够建立起来。只有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的主体性交流开始，才能描绘好千灯互照的愿景，走上民族共生的坦途。这是建设民族新生态的第一步，是关键的一步。

## State Building and New Concept of *Minzu Ecology*

NARAN Bilik

**Abstract:** In state-building we have to handle the problem of “unity and plurality” satisfactorily. China as a unified state is the reality of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while China as a society of plural ethnic cultural communities is a historically established pattern. The original Western nationalistic notion of “one nation, one state”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rough localization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China needs to transcend the basic instincts of nationalism and redevelop the primal affection that accompany “the curtain of ignorance”. Excelling in acquiring local points of view, anthropology has devised the diversified classification of “divisibility” (not “individuality” of the West). The classification is a great revelation to us when it comes to our creating new metaphors concerning the state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our establishing a new culturally innovative pattern. In state building, China must not follow the conflicting assimilation road of “one nation, one state”. Instead, it should take the new ecological road of multiethnic coexistence and mutual respect.

**Keywords:** unity and plurality, primal affection, divisibility, mutual respect, new concept of *Minzu ecology*

(责任编辑 廖国强)

<sup>①</sup>姚大力：《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第ix页，参见[日]杉山正明《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西夏、金、元》，乌兰，乌日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